

● 社会学

从发展观演变的角度评中国的新发展观

欧阳海燕, 马久成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2)

[作者简介] 欧阳海燕(1977-), 女, 湖南桂阳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人与文化研究; 马久成(1962-), 男, 天津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人与文化研究。

[摘要] 发展观是对发展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 它体现出人们对发展的基本价值判断。发展观的演变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经济发展观阶段; 社会发展观阶段; 可持续发展观阶段; 人类发展观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其发展观也经历了一个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到重视社会发展, 继而至关注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再到提倡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演变过程。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五个统筹”的新要求, 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对我国国情作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深化和创新, 蕴含着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发展观。

[关键词] 发展观; 经济发展观; 社会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 人类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 C91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2-0241-06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了“五个统筹”的新发展方针, 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 这是总结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提出来的, 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 是我们改革目标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认为,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深化和创新, 是新的科学发展观,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发展观。

一、发展观演变的四个阶段

发展观是对社会发展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 它体现着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判断。发展观的演变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 经济发展观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新独立的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着经济重建和发展的问題, 西方经济学家按照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各种发展道路, 其代表人物是刘易斯、罗斯托, 几种典型的思潮包括二元结构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结构论, 讨论了以资本积累为必要条件, 以二元结构转化为基本内容的发展模式。刘易斯认为, 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储蓄和

投资的增加为引擎,以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费景汉和拉尼斯以刘易斯的理论为基础对二元经济的发展道路及其动力问题做了进一步探索。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论》一书中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以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资本积累的论点为前提,以经济“起飞”为核心概念,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1971年又补充了第六阶段。此外,库兹涅茨、钱纳里等著名经济学家,分别从统计和计量经济学角度证明了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为经济发展阶段论提供了证据。

战后西方经济学家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认为“发展=经济增长”。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人们关心的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国发展水平高低的惟一标准。然而,这种发展战略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自身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无论是巴西的“经济增长彗星”、伊朗的“一个经济神话的破灭”,还是巴基斯坦的“不幸结局”,都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普遍的福祉,相反却带来了诸如人口膨胀、过度城市化、社会政治动荡、分配不均、社会腐败、生态危机等一系列新问题。学术界称这种现象为“有增长无发展”,“无发展的增长”,甚至“恶的增长”。

(二)社会发展观阶段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早期发展理论的立论依据和研究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许多观点也受到了“修正”乃至否定,当代西方发展理论进入到新的演变阶段。一方面发展理论家们开始把考察的视线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转向广大落后国家的发展实践,出现了以“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新的发展学派;另一方面人们逐渐摆脱了“发展=经济增长”的狭隘观念,对发展涵义的探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依附论认为,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是建立在对边缘国家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基础上的,并造成了后者对前者的依赖和从属。因此,非西方国家已不可能在同样的初始条件下重演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而必须脱离西方控制,实现自主发展。世界体系理论则从全球视野,将整个世界视作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相统一的大体系。探讨现存世界格局形成和演化的原因、条件,分析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并对今后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作出预测。

与早期发展理论相比,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从经济与社会结构出发分析不发达国家贫困的原因,表达了对第三世界发展主体地位的深切关怀。然而,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中仍然只有一个主体、一个中心,第三世界很难摆脱受控制、受奴役的地位,这种发展观是不完善的。

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文献中,对发展涵义的解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并把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1965年,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汉斯·辛格在一篇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不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增长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发展是增长加变化,而变化不单在经济上,而且还在社会和文化上,不单在数量上,而且还在质量上。”^[1](第5页)1968年,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发展不只是GNP的增长,而且包括整个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过程的上升运动。

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出现了一股否定经济增长的潮流,认为发展应当是对贫困、不平等和失业等社会问题的改善。代表人物是达德利·西尔斯。他于1969年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际发展协会第11届世界大会上的演讲中明确地反对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在《发展的意义》一文中,西尔斯指出:“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是:贫困发生了什么变化?失业发生了什么变化?不平等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这三个方面都变得较不严重,无疑,这个国家就经历了发展。如果这三个中心问题中一个或两个恶化了,特别是三个问题都恶化了,那么,即使人均收入成倍增长,把这种结果称为是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2](第2、3页)

整个20世纪70年代,在发展文献和国际机构的文件中,再也不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而是把增加就业、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在这一时期,国际劳工局提出的《世界就业计

划》、世界银行制定的“增长的再分配”方案和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起的“基本需要战略”就是这一时期发展观和发展目标改变的具体表现。但是,这一时期的发展思想过分地否定了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一些学者看来,经济增长似乎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其必要条件。这些观点和政策方案显然过于偏激,因而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于是,很快被人们遗忘了。

(三)可持续发展观阶段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和进展,它作为一种新型的发展观于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80年代形成,90年代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生产要素和科技投入,经济取得较大增长,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现代化,经济总量也有相当程度的提高。但这些增长的背后是大量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被掠夺性地开采、利用,出现了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生态恶化、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

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关于发展观念的争论。10年后,《只有一个地球》把人类对生存与环境的认识推向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环境时代”。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首次对“可持续发展观”作了系统的阐述。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以此为主题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该报告经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后,成为世界各国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纲领性文件。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专题讨论了环境与发展问题。这次环发大会有两项主要议案,即《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前者又称为国家和人民关于环境与发展行为基本准则的宣言,后者是在全球、区域和各国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本次会议使人类对环境与发展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阶段,即环境与发展密不可分,两者相辅相成。会后,可持续发展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其实践活动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当代社会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和危害,从而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持续、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旨在追求“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和“人之间和谐”,它不仅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生态、资源等方面的诸多因素,而且还要涉及到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诸多因素。最近10多年,世界各国已经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内涵和哲学的思辨中逐渐解脱出来,从理论层面深入到可操作的具体实践之中,可持续发展成了指导全球和国家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和基本战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原则被迅速地编写和融入到各类具体发展规划之中和发展行动之中,成为判断国家、区域发展是否协调、有序、健康的重要标准。

(四)人类发展观阶段

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经济增长的涵义较窄,通常指纯粹意义上的生产增长。而发展的涵义较广,除了生产数量上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和某些制度的变化;不仅包含经济的发展,还包含社会状况的改善和政治体制的进步;不仅有量的增长,而且还有质的提高。这一阶级发展观的视角也从“物”转向了“人”,转向了人的需求的满足和人的发展。此外,这一时期的发展观能够较客观地评价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认可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更强调社会发展的全方位性,突出人的发展是发展的目的和核心。对这种发展观视角的转变,笔者称之为人类发展观阶段。

二、人类发展观的形成

1971 年,发展学者丹尼斯·古雷特就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发展的本质问题。他指出,发展包含有三个核心内容,即生存、自尊和自由。所有这三个核心价值构成了发展的本质。但是,要达到这些发展目标,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学术界对发展的综合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指出:“应该把发展视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量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有人们习惯和信仰的变化。”^[3](第 50 页)1983 年,法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提出了“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新发展理论。这种新发展观综合了“人的发展第一”和“基本需求战略”等观点,强调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的协调,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作为主题,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成员的全面发展。1987 年,埃德加·欧文斯在《发展中世界的自由前景:伴随政治改革的经济发展》中进一步提出:现在该是我们把政治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的时候了——不仅考虑社会能够变得更有生产力的方式,而且考虑社会应该变得更有生产力的质量,即是说人的发展重于物的发展。

人类发展观的流行和普遍被人们接受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0 年首次提出人类发展这一概念为标志。《人类发展报告》中把人类发展界定为扩大人们进行选择的范围。如阿马蒂亚·森所言,人类发展不能仅凭最终状态来判断,有选择的自由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990 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每年都建构人类发展指数(HDI),旨在用一种简单的复合指数来度量在人类发展的基本领域中所取得的平均成就,并由此对各国进行排序。此后又编制出三种补充指数:人类贫困指数(HPI),与性别有关的发展指数(GDI)和性别赋权尺度(GEM)。然而,“人类发展的概念比人类发展指数和这三种补充指数的范围大得多。现在不可能想出一种全面的衡量尺度,哪怕是一套全面的指标,因为人类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面,例如,参与社区生活,就不容易量化。虽然简单的综合衡量尺度能十分有效地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注意,但是这些指数不能充分说明有关人类发展的许多问题。”^[4](第 9 页)此外,人类发展报告强调,“人类发展不是一个与可持续发展相脱离的概念”,“可持续性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5](第 12 页)

三、中国的新发展观

人类发展观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综合发展观。它摒弃了经济发展观单纯用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一国发展水平的作法,也纠正了社会发展规划阶段对经济增长过分贬低的观念,并且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要求把发展看成是在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价值观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扩大人们的选择,同时保证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过程,体现了人们对发展问题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其发展观念也经历了一个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到重视社会发展,继而到关注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再到提倡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演变过程。不论是建国初期的“大干快上”,追求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增加,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有水快流”,追求 GDP 的提高,都反映出了当时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人民物质生活条件亟待改善的社会背景下,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念。改革开放以来的 25 年,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协调进步,以及环境与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惊人。

近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9

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8个方面:由国有企业改革引起的失业率上升;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增加;腐败现象的蔓延;公共财政能力的减弱;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住房改革;歧视妇女现象的重新抬头;自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9](第50页)。美国兰德公司(RAND)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2003)中主要从8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瓶颈因素,这8个方面是:失业、贫困和社会不稳定;腐败的经济影响;艾滋病和其他传染性疾病;水资源紧缺和污染;能源消耗和价格;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可能缩减;台湾问题和其他政治冲突^[7](第11页)。世界银行《中国国家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经济增长》(2003)认为,今后中国将面临收入差距扩大的严峻挑战。如果目前城乡家庭收入差距和各省城乡家庭收入增长速度不平衡的趋势持续下去,收入差距将会急剧扩大,基尼系数将会从1999年的0.437上升到2020年的0.474^[7](第14页)。概言之,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以下5方面的挑战:(1)城乡差距扩大。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城乡居民之间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矛盾,城乡差距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2)地区发展差距扩大。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不仅表现为人均收入或人均GDP差异大,而且还表现为其他经济、社会指标差异甚大;(3)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首先是经济发展与健康指标发展速度不一致;其次是硬件投资和软件投资不匹配;再次是经济财富迅速增加与社会成本急剧扩大,社会不安全感愈来愈突出;(4)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我国资源总量大,但人均占有量少,资源供给形势严峻;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林木蓄积量急剧下降,草地退化、沙化、碱化现象严峻,大气污染严重,水体污染加剧水资源短缺;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的国民财富损失巨大;(5)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协调。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大规模结构调整阶段,突出表现为“下岗洪水”、“失业洪水”和“转型贫困”人口迅速增长^[7](第17-43页)。可以说,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正是在这样一个国情与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

我们认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新要求,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新时期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重大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新的实际出发,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而提出来的,是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深化和创新,蕴含着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发展观。它包含五项原则:第一是人本,第二是全面,第三是均衡,第四是协调,第五是持续。“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就是把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和中心,在社会发展中以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发展为终极目标。“全面”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结果,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证,文化是先导,三者紧密关联,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统一于社会的发展之中。“均衡”是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均衡发展要求实行新的区域发展模式,要求资源配置合理化、经济布局科学化、收入分配公平化,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确保各地区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协调”是科学发展观的中轴。协调发展是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内部所包含的不同领域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是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和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相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发展形态。“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支点。由于受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束缚,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必须通过体制改革、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发展观也是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基于科学发展观,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纳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党的执政理念的发展和进步。

[参 考 文 献]

- [1] [德] H·W·辛格. 社会发展: 最主要的增长部门[J]. 国际发展评论, 1965, (3).
- [2] [英] 达德利·西尔斯. 发展的意义[J]. 国际发展评论, 1969, (12).
- [3] [美] 托达罗. 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 [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2001 年人类发展报告[R].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 [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1998 年人类发展报告[R].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 [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1999 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R].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 [7] 胡鞍钢. 中国: 新发展观[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于华东)

On New Development of China from the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OUYANG Hai-yan, MA Jiu-cheng

(Sociology Depart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Biographies: OUYANG Hai-yan (1977-), fe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ociobogy Depart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majoring in Chinese people & culture; MA Jiu-cheng (1962-),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ociobogy Depart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majoring in Chinese people & culture.

Abstract: The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reflect the people's basic attitudes to the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the growth development theory;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human development theory. The evol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theories of Chinese government could also be divided into the above four phases. The Five Overall Plans, which was brought up by the government in 2003 is the newly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ory. The newly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ory, which reflects the situation of China and the further studies of the development theories, is the human developmen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development theory; growth development theory;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continued development theory; human development theory;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ory